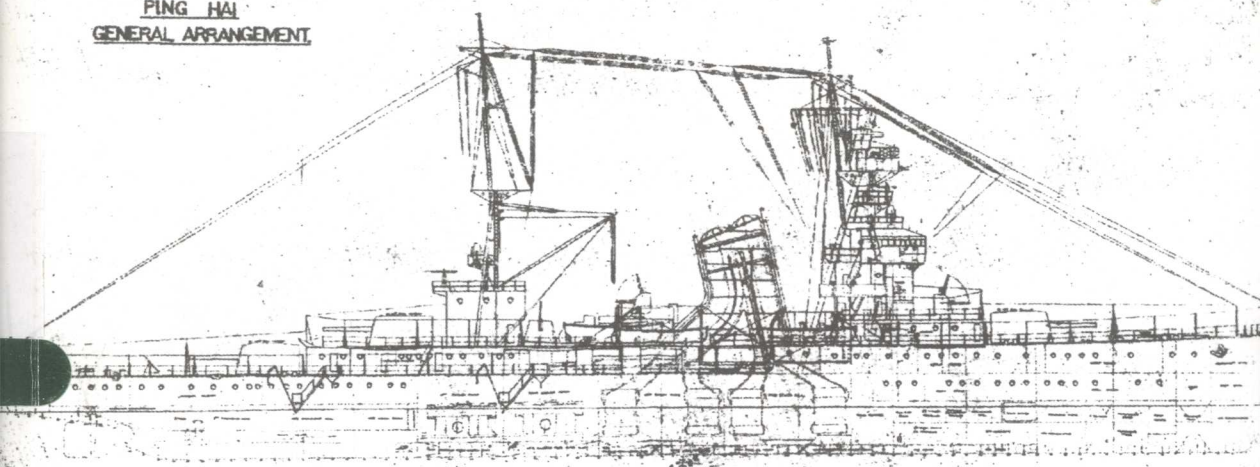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 中国海军论集

◎ 翁 军 马骏杰 编

PING HAI
GENERAL ARRANGEMENT



山东画报出版社

014034371

E296.53
05

民国时期 中国海军论集

◎ 翁 军 马俊杰 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



北航

C1722703

E296.53
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时期中国海军论集 / 翁军, 马骏杰编.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474-0983-1

I. ①民… II. ①翁…②马… III. ①海军—军事史—中国—
民国 IV. ①E2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4976号

责任编辑 怀志霄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70毫米×228毫米

42.5印张 750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说 明

本文集着重收录民国时期主要期刊刊载的有关中国海军问题的论文，虽然文体、篇幅、语言风格等都有较大差别，但反映的主题却十分鲜明。为方便读者参考起见，所选文章原则上以发表时间顺序排列，连载文章为保持连续性，对顺序进行适当调整。

民国时期有千余种期刊面世，所刊载的与海军有关的文章数量庞大，本文集主要选录能直接反映海军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论文，新闻报道、档案资料以及有关海军技术的文章不在选录之列。由于我们掌握的期刊数量有限，遗漏在所难免。

民国期刊林林总总，不仅风格不同，而且编辑水平、印刷质量、纸张成色等差异很大。同一期刊，不同时期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些期刊编排、文字等错误较多。对于明显错误，我们直接予以纠正；对于难以判断正误的用词，或明知有错误而对研究者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词语，则用“（）”标出，以保持原貌。对于模糊、漏印或其他难以辨认的字，用“□”代替。

本文集所选文章均注明期刊名称及发表时间，文章内容所涉及的专业词语，我们尽量进行注释。对于文章作者，由于我们掌握的材料有限，有些进行了或简或详的注释，有些则留待以后注释。

本文集所辑录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全文登录，对于有些文章存在的观点和方法上的不妥，为保持文章原貌，不作处理；对于个别涉及敏感问题的文章，我们进行适当删节处理，用“……”标明；对于缺页而内容又必须收录的文章，也用“……”代替缺失内容。

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不够充分，编辑能力有限，错误和疏漏一定不少，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翁 军 马骏杰

2013年12月14日于山东烟台

前言

民国时期是中国海军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织，使国家建设卷入难以自拔的战争漩涡。作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重要工具之一的海军，本应在纷乱的时势中有所建树，但由于当政者错误地颠倒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顺序，使海军处于欲用无力的尴尬境地，仅仅成为平衡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一颗微小砝码，不能承担卫国保民的重任，正所谓“我国岸线之长，合大小港湾出入计，不下万余里，非有强大海军力，断不足以敷分配而固疆圉。然而吾国海军，其足以负此重任否耶”（郑颖乎：《对于海军进行之管见》）。无数仁人志士目睹此情此状，急切地发出整饬和建设海军的呼声。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正是这些呼声的反映。文中无论是经过深入思考的理性筹划，还是满怀情感的强烈呼吁，都饱含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忧虑。这些文章的汇集，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海军建设的概貌，为今日的海军史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和有价值的史料。更为重要的是，文中对中外海军的比较，足以引发人们对中西海军实力差距及因果的思考；文中对海军与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关系的分析，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中国海军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今日中国海军建设的鉴戒作用。

民国时期海军建设的恶劣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下西方海军理论的广泛传播，是中国海军思想逐渐活跃的时代背景。

进入民国时期后，尽管腐败的晚清政府已不复存在，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没有改变，新萌生的各派封建势力，为争夺国家控制权，争相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亮相。

它们在烽烟如荼的中国大地上展开了连年混战，严重内耗了国防力量。由于混战的战场主要在陆地，因而海军仅仅作辅助力量用于作战，军阀们谁也不肯投入人力和物力去建设海军。军阀混战平息后，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族危难，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倾尽全力镇压刚刚兴起的革命运动，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国共战争，依然不给海军发展的机会。整个民国时期，海军“由统一的分做南北的，由南北的变为各省系的，完全寄生于各军阀之下以供人利用”（郭寿生：《中国海军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海军建设蓝图无从规划，更不可能上升为国家政策。

与内战相比，更为严重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外海和内河权益大加践踏，更有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将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使中国彻底陷入民族危难之中，海军建设更无从谈起。在民族抵抗的强大洪流中，中国海军曾一度铁血激情，奋起抗击，但终因力量微弱，在长江和沿海抗战中，几乎全军覆没。战舰沉毁，军港遭占，海岸线被封锁，中国尝尽了无海军而带来的所有苦痛。

抗战胜利后，在美英等国的帮助下，国民党政府曾一度重建海军，但这支海军依然难逃内战的命运，在革命洪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下，其最终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一支海军，如果它不是为维护国家海上利益而生，那么它的生命一定不会长久；一个沿海国家，如果失去了海防，那么它的命运一定同海军的命运一样悲惨。这一结论，不但被中国海军建设实践及国家境遇反复证明，而且也被世界海军的蓬勃发展和大国兴衰的事实反复证明。如此残酷的现实，对中国海军界、学术界，乃至整个知识界的刺激一日甚于一日，从而推动了海军思想的日益活跃。

与中国海军的惨淡经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列强为巩固海外殖民地、掠夺海外资源、保护海上贸易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海军。中国的有识之士不仅听到了来自西方海上争夺的隆隆舰炮声，而且了解到了海军强国赖以发展的海权理论，于是，他们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勾勒出一幅幅西方海军发展壮大的轨迹图，向国内各界进行广泛展示，以此作为振兴中国海军的重要依据。这一时期，学术界分别在《东方杂志》《海事》《外交评论》《四海半月刊》《海军杂志》《海军期刊》《海军整建》等广受关注的期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并出版著作，深入讨论近代以来中国海军衰败、西方海军发展的过程与原因，力求在比较中认清中国海军建设的实质。特别是对西方海权思想的介绍与研究，

激发了人们从海权的视角探寻中国海军振兴道路的热望，形成了可贵的思想潮流。

二

国内各界以期刊为阵地对海军问题的讨论，是从吸取甲午年海军战败及其之后持续衰落的深刻教训开始的。张荫麟的《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胡宗谦的《国防破碎中之中国海防与海军建设问题》、郭寿生的《“九二三”与甲午之战》、田汉的《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都是典型代表。这些文章，字里行间透显着作者“甲午之辱，国无日不在吾人心目中”（止涯：《论振兴我国海军宜注重精神基础》）的雪耻之心，对甲午海战诸细节的全面研究和对战败原因及影响进行的深刻探寻，是民国海军建设的先声。作者们鉴于“甲申、甲午两役，全师烬焉。自是以后，朝政日非，外侮日亟，沿海要港，多被租借”（《中国海军之过去与现在》）的惨状，提出一系列整饬海军的主张。尽管他们还理清不清纷繁的政治头绪与海防建设相互交织形成的复杂矛盾，但依据世界海军建设理论和中国海防建设实际而提出的建设海军的主张，却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然而，对战争失败反思的结论，无论如何都无法影响民国政府的决策决心，因为不管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都不可能真正从甲午战败中汲取教训，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于内战中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上，对外反侵略战争的成败对他们来说远不如能否完成“内战大业”牵动心思，这就造成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海军发展的环境始终不能改观，有识之士所希望看到的海军振兴遥遥无期，民族危难越来越深重。正如陈绍宽所言：民国以后，“时局多故，政府实力，胥操于军阀掌握，排斥异己，视海军若仇敌，海军同人虽竭力疾呼，唇焦舌敝，终不能使若辈发生扩张海军，巩固国防之观念，甚至海军寻常饷糈，亦殆有不能维持之势”。直到日本再次发动侵华战争，海防建设依然在艰难中徘徊，海军不得不接受屈辱之战，被逼上覆亡的道路。

这种状况更加激发了社会各界建设海军的迫切愿望。民国伊始，就有海军人士强烈建议“整饬海军”，提出“军人心性的改造”“海军学校教育的改良”“水手兵士生活的改良”“打破各省畛域的私念”“打倒国内的军阀”“保护国外的华侨”等一系列主张（郭寿生：《中国海军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紧接着，建设海军的各种观点纷纷出台，如“急筹飞行、潜艇、教育以图自存”（郑颖孚：《对于海军进行之管见》）、“振兴海军宜注重精神基础”（止涯：《论振兴我国海军宜注重精神基础》）、“严禁把持”“整

饬军纪”“监督购械”（石竹：《整顿中国海军问题》）以及军令、军政、人才、教育、制舰、筑港、军需不能分离（玄楼：《海军统一论》）等等。它们从宏观到微观，全面规划了海军建设。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各界，尤其是海军界鉴于“中国的海军新建设，虽有待于抗战胜利的结束之后，然其计划与准备则不能不预为之谋”（陈绍宽：

《海军抗战工作之回顾与前瞻》），便结合战争实际，为海军当前和长远建设出谋划策。

有的提出，未来海军建设须重视“心理建设”“人才建设”和“物质建设”（郭寿生：《保护华侨与促进海军建设》）；有的认为，加强海军建设“制度建设”最为重要（王师复：《海军制度之理论与实际》）；还有的主张，未来海军之建设，“集中力量”“绵延学术”“储备人才”必不可少（刘襄：《在抗战期间吾国之海军问题》）。此外，“精神之改造”“生活之改进”“智能之充实”（唐静海：《对海军之期望》）等也均被纳入海军建设规划中。

应该说，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海军建设的研究，层次丰富，涉及面广，勾勒出了海军建设理论的清晰轮廓。

三

从本文集所收录文章来看，民国时期的海军建设理论，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一、海军建设与海防建设关系思想。论者从“有海岸必须有海军”的认识出发，有的把国防、海防、海军三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认为“欲图国防，当先注重海防”，国人如不“转移视线齐目注海，力图海防，则亡国灭种”，“海军力弱”，则海防“未备”，“不创海军”是“自杀政策”（胡宏基：《军舰新界说与中国海防》）；“吾国海防之振备，似非有强大之舰队，无以固邦基而张海权”（胡宏基：《如何巩固中国之海防》）；“中国海防目的在防守，然防守亦须有相当之海军”（胡宗谦：《国防破碎中之中国海防与海军建设问题》）。有的从国防、经济、海运、海军四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统一中寻找答案，认为“立国的要素虽是很多，而其主要条件，厥为国民经济和国防两樁事情。有了经济，方可以固国防，无国防怎能保护经济。经济和国防，实相需相成。同时发展海运，既足以充实经济，复能够助长国防。海运进展就富强，反之就贫弱。可是要想海运发展，非有战舰潜艇，强劲的海军实力不行”（李一萍：《明日的中国海军》）。也有的从陆海空三军互相依存、互相协同的战略战术需求出发，认为海军在国防中的作用是“增强陆军和空军的作战能力”“截断敌人的海上运输”“阻截敌人舰队的进逼”（廖宗刚：《海

军与国防及商业之关系》)等等。可见,论者始终把海军建设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起来,突出海军建设的重要地位,为未来海军建设铺平道路。

海权思想。民国时期,马汉的海权理论以更加准确、更加易懂的翻译再度在中国传播,国人对海权的认识随之更进一步。早在1919年9月,孙中山就呼吁:“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昔日之地中海问题、大西洋问题,我可付诸不知不问也;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人方以我为争,我岂能付之不知不问乎!”^[1]在知识界引起反响。1927年12月出版的《海军期刊》从第1卷第6期开始连载唐宝稿翻译的《海上权力之要素》,首次把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核心部分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人。1940年,淳于质彬也以《海权因素之研究》为题,翻译了马汉的同一本书的相同部分,刊载在《海军整建月刊》第1卷第6期至第8期上。同时,该刊还刊载了王师复翻译的马汉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海军战略》。此外,介绍马汉及其著作的文章也不断见诸报端。马汉的海权理论,使中国社会各界,特别是海军界,仿佛找到了一把打开思想闸门的钥匙,人们不断用海权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海防、海军问题。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学术界讨论海防、海军问题时使用“海权”概念明显增多,对海军的理解也日益加深。有的把太平洋问题的实质看作海权的争夺问题,提醒国人“太平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假使世界上有一野心家能控制太平洋,即可以控制世界”(胡秋原:《中国的太平洋》)。有的把海军建设作为维护海权的重要基础,认为“吾国海防之振备,似非有强大之舰队,无以固邦基而张海权”(胡宏基:《如何巩固中国之海防》);“欲发展一国之海权,其唯一之要计,在拥有足以发挥此种权力之工具,换言之,即必须特有海军的实力以为之后盾也”(陈绍宽:《对于国防上之感想》)。有的从海权得失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为“古今民族之兴衰,大都基于海权之消长”(吕德元:《海军之与民族复兴》);“一部世界史,大部分是海权争夺的历史,只有海权确定之后,一个斗争才算确定”(胡秋原:《中国的太平洋》);“世界各国在三千年之历史中,凡属滨海国家其臻强盛者,无不系于海权,而海权之能发展与否,亦无不系于海军实力之强弱。中国系三面濒海之国,海权之得失,关乎国力,国防之趋势,尤重海疆”

[1]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4月版,第119页。

(陈绍宽:《我国海军之建设及演进》)。有的甚至提出“海权、海产、海运、海军”“四海主义”救国的主张(沈鸿烈:《四海主义救国刍议》)。

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在丧失海疆的深痛中讨论海权问题,更加深了对海权理论的认识和感受。他们高度认同马汉的思想,认为海权“包括三个要素:一是海口,二是海上运输力,即船只,三是海上战斗力,即是保护或进攻前两者的”(胡秋原:《中国的太平洋》),进而认为“海军的基本原则是取得海权并行使之”(王师复:《海军制度之理论与实际》)。他们深感“我国之所以一再受到列强的侵略蹂躏,丧权辱国,主要的原因也在海权旁落‘海禁大开’以后”(易克秉:《海军在中国国防上的重要性》),高呼:“我们立国于太平洋西岸,海岸线绵延一万三千余里,要保持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与促进世界之和平,必须要能保卫这辽阔的领海,维护关系国家命运的海权,而这一任务,必须要海军来达成它!”(巨公:《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海军》)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抗战,必须恢复我国所有的海权与海上的自由,而后才可以说到最后的胜利。”

(郭寿生:《保护华侨与促进海军建设》)对于未来,“建立海权,保障海运,必成为建国最重要工作之一,而建立海军以控制海权则更为天经地义的必需条件”(魏济民:《中国海军建设论》)。可见,抗战时期对海权的讨论,以马汉海权理论为依据,以战争实际为例证,更加深入,更有说服力,绝非现在有些论者所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海军主要在沿长江一线打击敌人。由于现实的制约,中国关于海权问题的探索再度销声匿迹。”^[1]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人们建设强大海军以御侮的渴望受到遏制,社会上对于海权问题的讨论已没有先前那样热切,只有海军界还在进行着谋取“振兴海权”的努力,例如提出建立以华北、华中、闽台、华南四个海军区为范围的“海权中心区域”的设想。(郭寿生:《新海军建设计划的研讨》)不过,此时的呼吁已难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民国时期的海权讨论就此接近尾声。

陆海空军平衡发展思想。自从飞机的作用在一战中一鸣惊人,国际军事家普遍认为,20世纪的战争已经成为由陆地、海面进到了天空的立体战争,飞机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角。新的战争理论对于始终找不到振兴军事良策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又是一剂可资尝试的良药。于是,在国外舆论的影响下,“航空救国”“航空万能”等论调开始在中国

[1] 鞠海龙著:《中国海权战略》,时事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5页。

社会蔓延。主张航空救国的人们认为，“现代的武器，飞机要算最利（厉）害的了。空军的威力，已达到后来居上的地步，陆海两军，虽仍有它们存在的价值，可是来和空军较量已逊一筹了。危在旦夕的我国，要想挽救危亡，非政府与人民共下决心提倡航空不可”。^{〔1〕}主张“航空万能”的人们认为，“自从有了空军，海军的重要一落千丈，尤其是在守土防敌方面，有了空军便不必再有海军”（陈西滢《海军与空军》）。这些观点，很快受到社会的追捧，一时间，“优空弃海”成为热门的名词，空军界甚至顺势提出海军仅维持潜艇用于防守海口，节约经费大力发展空军的主张。

毋庸置疑，飞机改变了20世纪的战争形态，其作用无可替代，但它作为空中兵器，不可能成为陆上和海上兵器的替代品而独立发挥威力。“航空救国论”“航空万能论”在军种发展问题上的偏见，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海空军孰优孰劣的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学术界思想活跃却不失理性。论者首先借用西方军事家的观点，如美国人蒲特因的飞机“为补助军队，是一种用度有限的武器”、苏联人斯洛温的“崇拜空军的人是太注视技术的成功而缺乏战略的思想……空军，还是一种次要于海军的力量”等观点，论证“优空弃海”的不可行性。其次，用一·二八事变的惨痛教训从反面论证空军对海军的依赖性。认为“现在的情势，空军固然要扩充，而海军之发展，也是刻不容缓的。瞧瞧此次淞沪之役，日本空军之强悍，实缘于海军之协力，盖空军飞机之能够超越海洋，远飞敌方者，实藉飞机母舰为之载运，战舰为之掩护，然后可以翱翔于太空。这样看来，非海军无以显空军远征之威力，无以竟空军的全功”（李一萍：《明日的中国海军》）。再次，从技术上论证飞机作战能力的有限性。认为飞机“当其飞行之际，途程之远，有其一定数，超过其续航力之限度，危险立见”，“空军能炸毁敌之要塞，能攻击敌之军舰，使丧失其战斗力，然而空军不能占领战略要点，而使之成为根据地”，“空军虽有公空之说，然无所谓根据地，空军虽一时据有制空权，而欲维持此既经夺获之制空权，则并其要塞即时占领之，在海应有海军，在陆应有陆军，而海军尤为重要，此空军之所不能”（戴占奎：《东南海防问题之研究》）。最终，论者得出了“近代战争，为立体之战争，陆海空军，必须协同一致，互相为用，方可御侮”（余秉钧：《海军与国防之关系》），“空军可以补充海陆军，但不能代替海陆军”（胡秋原：《中国的太平洋》）的结论。

〔1〕 狄仇：《空军作战论》，《空军》1933年第15期，第12页。

这场集中爆发于抗战之前的争论意义重大，它使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对海空军密切结合的理想平台——航空母舰的认识，建设“海空军”^{〔1〕}的设想遂向现实迈进了一步。

设定假想敌思想。世界近代军事理论表明，一国的国防建设，往往需要设定一个或几个假想敌以确立方向和目标。假想敌一旦设定完成，在一个时期内不会轻易改变，假想敌国军事力量的发展状况和目标，便成为这一时期战略或战术的参照系。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本文集的若干篇目中。

何为假想敌？胡宗谦认为，“所谓假想敌人，即依本国平日所处之国际环境，以与本国利害冲突最烈之国家”。在军阀混战时期，海军由于没有假想敌作为参照系，其战斗力无所谓强弱。但在民族危难之中，面对外国强大海军的进逼，中国海军弱态立现。因此，呼吁设定假想敌，是学术界确立海军建设目标的前提。同为海军史学者的著名作家田汉指出：“我国过去海军建军的失败，完全因为没有坚定不移而且成为共信的目的——想定敌，其他一切缺点可以说都从这一缺点产生出来的。”由此，假想敌问题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论者认为，设定假想敌的战略意义在于，不仅能建立国防建设的参照标准，而且也能建立海防建设和海军建设的参照标准。他们指出：“建设国防的标准，那就是假想敌的确定。”“有了假想敌，我们不仅找到了国防的重心，并且获得了建军的比例和数量。”（星德：《海军国防论》）“欲巩固我们的海防，必须先估计假想敌国的海军力量，以作我国建设新海军的标准。”（郭寿生：《中国要建设六十万吨海军之理论检讨》）这种看法，“不止中国如此，即以列强来说，也无不以其假想敌建立坚定的国策，再根据坚定的国策确定其海军政策”（君威：《恢复整建海军的领导机关——海军部》）。

然而，对于如何确定假想敌，论者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假想敌可为多个目标，“凡侵我犯我者，皆假想敌也”（胡宗谦：《国防破碎中之中国海防与海军建设问题》）；有的认为，假想敌应集中于一个主要目标，“美国的假想敌是日本”，英国的假想敌“就是有侵犯它殖民地可能性的国家”，“德国的假想敌始终是英国”，而“我们的假想敌是日本”（张达礼：《论国防商业与海军》）。后者是一种较普遍的认识，是根据各国民族矛盾状况作出的正确判断，对中国调动有限人力财力集中对敌，具有重要意义。

〔1〕即海军航空兵。

论者还认为，设定假想敌的战术意义在于明确海军实力对于假想敌国海军实力所占的比重。这个比重，因国际国内状况不同而各异，或者“对假想敌海军吨数至少应作八成计划，数量方面可有少量之相差，但在质的方面，应比假想敌更加精良”（戴占奎：《东南海防问题之研究》）；或者“我们的假想敌既为日本，则我们建设守势的海军对于日本攻势的海军，亦须在其五成以上”（郭寿生：《中国要建设六十万吨海军之理论检讨》）；或者“制舰计划，固当以敌国海军为标准，力有不逮，亦当筹划有以当其十之六七，或十之四五”（玄楼：《海军统一论》）。无论建设“八成”“七成”，还是建设“五成”“四成”，均是对中国海军现状的超越，对激发社会动力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海军建设思想。海军建设是海防建设的核心内容，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尽管不同的阶段学术界会随国际国内形势的不同提出不同的方案，但这些方案不会偏离战略、战术、制度、人才、装备、基地等主要问题。

关于海军战略，王师复的论述颇有高度，他认为，“海军的基本原则是取得海权并行使之。其目的在保护自方海洋之交通与阻碍敌方对海洋之自由运用，以达到输送自方远征队与贸易及破坏敌方远征队与贸易之目的”。不过这一论断对中国海军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晚清以来，中国并没有“自方远征队与贸易”的“输送”，也就谈不上“保护自方海洋之交通与阻碍敌方对海洋之自由运用”，故中国的决策者把海军战略确定为防御的、消极的、保守的。这一状况违背了“海军的基本原则”，已使国家利益付出了沉重代价。所以对海军战略的探讨一度十分活跃。上世纪30年代中期，胡宗谦重提“攻势防御”的海军战略思想，主张建设三条防线，即“潜水艇防卫”“海港军港建设”“江河要塞和内陆要塞建设”，认为“三大防线，第一、第二两道防线，易为敌所摧破，而最后决胜负存亡者，厥为第三道防线。斯防线之得失，关系中国之存亡，于可能力量内，应全神经营之，以破釜沉舟之决心，以‘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战略，来与侵我犯我者作殊死之持久战焉”。上世纪40年代初，吕超也提出“三道防线说”，但与上述含义大不相同，认为“一国的国防，军事学家向来把它划成三道防线，以敌人的领土领海为第一道防线，以本国国境为第二道防线，以本国内陆为第三道防线。所以就战略原则说，总以能在第一道防线发挥力量为上策，尤以获得制海权，使海上交通无阻，贸易自由，为特别重要”。两种“三道防线说”，虽然没有深刻的理论阐述，但强调的“攻势”战略，都与中国实际极其符合。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再次证明中国消极防御海军战略的危害性，王师复迅速从海

军战略的一般原则，回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他强调，中国海军“是采取守势的战略，其目的在于保卫江阴封锁线的安全。但是在战略上，所谓守势并不是单纯的‘守’，而应涵有相机进攻的意义”。对此曾万里解释说：“关于独立之作战方面，应一扫从前防御的、被动的战略，尽量发机动性的运动战，要永远能够自立地乘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予敌人海军以绝大（打）击，消耗它，阻碍它，不特使其舰艇不敢进犯我现在各战区之阵地，且不能在我阵地附近若干里内肆其活动。同时并切断其主要水上交通，以控制其军运与商运。”事实上，中国海军在经过了一系列消极的阻塞战、要塞战和水雷战之后，在抗战后期，开展了广泛的布雷游击战，而后者确实“涵有相机进攻的意义”，它的目的“是针对着敌人资力、军力双管齐下，使敌方在军事上、政治上、物资上、精神上均受重大影响，而促其早日溃败”（林遵：《关于今后我国海军游击战争问题之研究》），带有明显的进攻性。

民国时期学术界对海军战略的探讨，至今对我们都有启迪作用。抗战胜利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探讨逐渐冷淡下来。

对于海军战术，学术界也有不少讨论。一些专著和军事院校的教材主要讨论一般战术，引用战例大多来自西方。期刊的文章则有所不同，论者除了讨论一般战术外，还结合实际，提出中国海军特有的战术原则。例如，他们先是从西方海军理论中吸取营养，广泛介绍西方海战中的战术思想，如郑颖孚的《对于海军进行之管见》、朱中良的《今后中国的海防建设》、陈绍宽的《我国海军之建设及演进》等。但这些探讨仅限于用西方战例说明问题，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显得有些脱离实际。到了抗战时期，由于中国海军在长江和沿海积累了一定的作战经验，因而对中国海军战术的探讨有了更强的针对性，提出了要塞战、水雷战、阻塞战、袭击战、水上游击战等一系列战术思想。

田汉认为，“我沿江沿海‘移动炮台’与‘水雷游击队’之活动实为劣势海军革命战术之最高运用”。李秉正认为，“水雷战术，为水上交通破坏战中最有效的方法”。君威认为，“阻塞战术，正是根据我们军事技术落后所决定，也是和陆空军根据技术的落后，不得不以消耗战为主歼灭战为次的战术一样，而且是互为表里”。最后一则总结道：这些战术“是灵活的，是偷偷摸摸的，而且是最冒险壮烈的。它的战果，不只能够阻止敌人的猛进，还可以帮忙陆军、空军一部分不能达到的工作”。

总体看来，抗战时期由于中国海军的微弱力量、狭窄作战区域和单调作战手段，限制了海军战术的运用和发展，海军战术思想也就不可能在一般原则上有所发展。

关于海军制度，王师复用一篇《海军制度之理论与实际》进行专门论述，他首先认真研究了中外海军制度产生的多种模式，确定了海军制度产生的真正原因——社会需要，试图揭示海军制度产生与发展的规律。他说：“海军制度是在社会生存的基础上，聚过去的经验而造成的一种适合的组织、政策、法度等之总和，以为建立新海军的准绳。它不是以现存军舰之多少为根据，反之，依社会需要所趋，还会改变现存军舰的组织。至现存的军舰不过是供应海军制度调节的资材而已。”接着，他论述了海军制度发展的三个条件：经济、技术和政治。认为经济活动对于海军制度有着伟大的促进力量，世界海军制度的扩充，是世界经济活动渐趋国际化的反映；技术推动了“海军教育之彻底的改变”“海军部技术机关之增设”“舰队组成之复杂化”，而这些都是海军制度发展的重要标志；政制不同，海军制度也有差异，从“海军最高统帅权”“海军长官之名称与资格”“军政与军令的关系”等方面，均可看出政治条件对海军制度的影响。最后，他得出结论：“为民族生存，我们需要海军，因而需要扩大现有的海军制度，相应于经济与技术发展的程度，并且还要适应国情而决定海军制度的方式。”

王师复的观点未必全面、无误，但他从社会内在运行的角度观察海军制度的方法是可取的，表明民国时期海军制度研究已达到相当高度。

除王师复外，还有少数探讨海军制度的文章，也提出了一些观点，但均不如王师复系统和深刻。

关于海军人才培养，自始至终都是民国时期讨论的话题，论者的观点涉及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一是强调人才对于海军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海军教育是兴复海军的基础，“欲兴复海军，则非预备人才不可。若欲预备人才，则非刷新教育不可”（玄楼：《海军统一论》），“我国海军一向疲弱不振，主要原因，不在量少，而在质的欠优。过去固不乏忠勇壮烈的将士，为国家民族建立殊勋，留下光荣事迹，但亦有深受封建思想余毒的时代落伍者，存着军阀派系观念，排除异己，自倨自尊，甚且贪婪、腐败、颓废、堕落，以至上行下效，把整个海军界，弄得乌烟瘴气”（许功：《新军制与新海军》），主张一方面造就海军新人才，“鼓励全国的海军热，使每一个有为的青年，觉得效命于祖国的最前线，是最光荣的”，另一方面改造海军旧人才，“增加质的浓度”（兼言：《育才第一》）。二是主张人才培养应借鉴西方经验。认为英美海军在教育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应一如既往地学习。除了选派留学生外，还可“筹设海军大学，聘请国外海军将官来华造就海军参谋人才”（张荫良：《海军建设之研讨》）。三是梳理海军人才培养类型。

认为海军是技术军种，人才培养“必须经过相当的时间，培育训练足资担任制造、航海、轮机、航空、枪炮、鱼雷、水雷、无线电、医务和其他各种专门技术的人才”，以创造建设海军的先决条件（郭寿生：《保护华侨与促进海军建设》）。四是提倡海军人才的精神教育。认为“海军教育，于学科、术科之外，应注重精神教育”（郑颖孚：《对于海军进行之管见》）。五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人才培养的各种方案。抗战前主要是增设海军学校、确定海军兵源、派人出国留学、培训旧有人员等。抗战后主要是充实训练机构、考选特种学兵、征求海军耆宿等等。

关于海军装备建设，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始终将其视为衡量海军实力的主要标准，认为海军建设的物质基础除了人的因素之外，主要是“坚利之舰艇与完美之兵器”。学术界对海军装备建设的讨论，往往与海防战略相联系，规划建设何等规模的舰队，首先论述海防战略需要何等规模舰队与之相适应。由于对海防战略的主张不同，对海军装备建设的意见自然也不相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日本为参照系，建设一支与海洋大国相称的海军，这是从我国因战败而衰败，西方强国因战胜而强盛的现实中得出的结论。论者指出，舰队理想的规模是：战斗舰5艘、甲等巡洋舰6艘、乙等巡洋舰20艘、驱逐舰90艘、潜航舰140艘、航空母舰1艘，57.5万吨（李一萍：《明日的中国海军》）。也有论者提出更大规模的造舰计划，认为中国海军应该拥有包括主力舰、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航空母舰和海防炮舰等283艘共计77万吨舰艇组成的黄海、渤海、东海、南海4个主力舰队和分驻于长江、松花江、珠江和黑龙江的4个江防舰队（石竹：《整顿中国海军问题》）。特别是抗战期间，海军界深刻感受到没有强大海军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强烈呼吁战后逐渐建设一支拥有战斗舰、重巡洋舰、轻巡洋舰、驱逐舰、潜艇、航空母舰、鱼雷快艇等舰艇625艘、最大规模260余万吨的海军。^{〔1〕}这些观点，虽然“有理有据”，但与中国的财力状况不符，很难引起国民政府的共鸣。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海军的初步建设，限于财力不可能“添置有力舰队，抗敌于外海”，应该“置六百吨小型潜艇十二艘，分为三队，以四艘为一队”，用于外海袭击。另置水雷敷设舰、高速鱼雷汽艇和牺牲小快艇用于海滨抗敌（郝培芸：《我国海防之商榷》）。按这种设置，中国海军的规模也仅仅只有几万吨，根本无法满足国家防卫的需要，因而受到很多人的质疑。

〔1〕 陈绍宽：《海军建设》，《海军杂志》1943年第16卷第6期“专载”，第5～6页。

总而言之，民国时期论者在积极主张海军装备建设时，始终处于一种矛盾心态：海军建设规模规划小了，难以适应海防战略的需要；海军建设规模规划大了，又与国家财力状况不相符。所以，方家论述舰队规模，难以形成定数。

关于基地建设，学术界始终把它与舰队建设联系在一起，因为“舰队之须军港，犹鸟之有巢，兽之有穴，人之有官室居处也”（玄楼：《海军统一论》）。论者指出：“中国海防的重心固在海军（即舰队），但沿海岸及岛屿上一切物质的军事建设，亦不可忽视。因为这不特是防御的工具，而且也是海军出击或守御的根据。”（星德：《海军国防论》）这些军事建设的核心便是基地，而基地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军港。所以，在论者的主张中，军港建设始终处于首要地位。

晚清时期，中国的军港多被西方列强所侵占，成为列强侵略远东的出发点，中国发展海军，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港口。所以在民国时期学术界的讨论中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收回已失的军港，二是开辟新的军港。认为“今能肆坛坫之周旋，图收复之壮举，策之上也。如其不然，当就未开辟之港，从此开辟之，或就条约之可与商榷者改订之”（玄楼：《海军统一论》）。可是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对于前者，在当前的国际形势及国力之下，断难实现，唯有在后者中寻找良策。

民国初年，孙中山就建筑海军根据地，在实业计划中的规划就是立足于开辟新港。他主张建筑位于大沽口和秦皇岛之间的北方大港、位于乍浦岬与澉浦岬之间的东方大港，和位于广州的南方大港，以及其他二等港和三等港。这一思路，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人们把“渤海军区”的葫芦岛、营口、龙口、烟台，“黄海军区”的胶州湾，“东海军区”的象山港，“南海军区”的榆林港、海南岛作为建设基地的首选（胡宗谦：《国防破碎中之中国海防与海军建设问题》），以此作为海军防卫东南沿海的大本营。

至于如何建设军港，胡宗谦的观点依然具有代表性。他说：“就各国军港之防御设备而论，空防则有飞机、高射炮、探照灯、听音器等；地面防御则有大口径炮、暗炮台等；地下防御则有秘密战壕、军械库、秘密守备队等；以及海面、地下之水雷障碍物等。反观我国之军港，除有几支小口径高射炮外，其他尚付阙如！海岸炮虽有，然已朽旧不堪，大抵系逊清之遗物。近顷军事科学化，日益迈进，中国海港若不有近代军备科学之设置，实不足以御敌人，此中国今日所以急需建设军港也。”也就是说，要借鉴西方建设军港的经验，纠正中国军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